

21世纪的眼光看中国

沟口雄三

(MIZOGUCHI Yuzo, 东京大学名誉教授)

I

在写作本文时，中国“神舟”号载人飞船成了日本媒体的热点报道。20世纪初承受义和团事件带来的苦难的中国在21世纪初却因载人飞船而成为话题，在20世纪初谁能想得到呢。

历史是不断流动着的。历史学者、仅限于E. H. 卡尔所称的参加现在的历史的历史学者们，他们观察问题的角度也是随着历史一同变化的。我们这些历史学者必须去摸索适应21世纪初的观察现代中国的新视点。

今天人们对近现代中国的认识，是从西欧中心主义的视点出发塑造的形象。即，中国近代是从鸦片战争开始的。

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落后了，中国才被迫走上了半殖民地的道路。

中国近代史的进程就是反帝、反封建、反殖民地的斗争史。

当然，这样的历史观是根据历史事实总结出来的，也的确是客观的史实。但是，正因为是这样，我们不能说这种认识就描绘了历史的全部。比如说，在这里有山有河也有平原，如果只告诉这里有河，即使可以说河的存在本身的确是客观事实，但也不能说我们就表达了河、山和平原都存在这个整体上的事实。鸦片战争史观、资本主义发展滞后史观、反帝、反封建、反殖民地史观等等，都是以“西方的冲击”为起因的历史观，并没有捕捉住中国历史的本质。

II

以上的历史观实际上都是在20世纪前期的历史中产生的，在这个意义上这些观点对于20世纪是必要的，但“使用期限”也应截止到20世纪。

比如，“反封建”是受清末严复《社会通论》影响的五四运动中出生的革命知识青年的口号，这是在与西欧的个人主义、自由、人权等近代的价值观进行对比后提出的命题。具体上讲“反封建”就是要打倒作为“封建家长制统治”的宗族共同主义。

但是，如果我们从中国（历史）的全部看的话，首先在中国并不存在西欧和日本作为社会制度的封建制——比如说不存在长子继承家业的世袭身份制，如果仔细考察被认为是“封建制”的宗族制度的实际内容就会发现，它也是为防止从均分继承制度中分离出来的社会流动的一种社会保险、互助的体系，很明显，把它当成“封建家长制统治”仅仅只把握住了事物的一个侧面。

“反帝、反殖民地”的确反映了帝国主义侵略及由此而来的半殖民地的历史事实。但是，中国并没有像印度那样成为完全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也不是说国土的一半被殖民地化了。另外19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并没有现在这样的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思想，对国土也非常大方。比如清末的革命家谭嗣同就曾主张把新疆划给英国，使英国和俄国为争夺这块土地产生矛盾，这样中国可以远离受到（英俄）侵略的危险，变得安全。中国知识分子对殖民地问题变得敏感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民族主义高涨后的事情了，从那以后，充满自豪感的中国知识分子开始不能容忍哪怕是毫厘的殖民地了。这一点上与印度的知识分子、比如说泰戈尔对殖民地的包容态度是不一样的。

总之，对外反帝、反殖民地、对内反封建是20世纪前期中国知识分子的一时性课题，决不是中国历史的全体性课题。

III

简单而言，从中国历史的整体进程上看，近代是从16—17世纪开始的，之后，在清朝的繁荣中，导致王朝体制崩溃的民间力量逐渐壮大，并发动了辛亥革命。

过去我在《方法论的中国》一书中提到，在中国“封建”一词从16—17世纪后含有地方自治的意义，这种所谓的民间自治以各种各样的形态在民间扩散开来，特别是太平天国以后，各省开始掌握军权，直到出现了各省的独立运动。

就是说中国历史上统治时间最长的清朝的300年历史过程，正是王朝体制慢慢崩溃的过程。人们可能提到康熙、乾隆盛世，但正是这种盛世造就了民间力量的壮大，这就是辩证法中矛盾的产物。

我们有必要了解辛亥革命以省份独立形式出现的时代本质。金观涛在其著作中指出，每当王朝崩溃的时候，中国大致上都会重复着地方叛乱（导致中央崩溃）的模式。

在王朝末期，中央集权的向心力丧失，地方叛乱导致了（权力的）分散化，接着下一个王朝再重新汇聚权力，就是这样不断重复着历史运动。但是，清末各省的独立运动却不尽相同，既是行政单位又是政治单位的省追求政治上独立、共和制或联邦制，就算是（权力的）地方分散，也与明末的李自成、张献忠和吴三桂等地方割据大相径庭。省的独立这种形态既是制度性的也是自律性的，其制度的形态和自律性本身就是反王朝制度的，因此辛亥革命不是王朝的崩溃而是“王朝制度的崩溃”。

IV

根据上述观点，我们应该怎样从历史全体的视点观察当代中国呢。

首先我们要突破近代历史是从鸦片战争开始的这种观念，向大家展示一幅浪漫的历史长卷，即从16世纪末开始直到20世纪中叶的期间，中国以其内在的历史动力缓慢地将延续了两千年的王朝制度推向灭亡，经过辛亥革命，终于创建了新的国家体制——中华人民共和国。1911年辛亥革命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经历了38年的动乱，其间不仅有内乱，还有帝国主义列强和周边国家日本的侵略。这38年说长也长，但是比起唐宋变革期间从唐朝灭亡到宋朝成

立的五代十国长达53年的割据和动乱来还算是短暂的。这38年尽管很复杂，但基本上可以将其特征归结为自秦汉帝国以来中国两千年王朝体制的崩溃和摸索新国家体制的中国历史上最波澜壮阔的时代。同时这个时期也是中国最丧失向心力、最没有抵抗力的时期。刚才我用了周边国家日本这个说法，日本位于中华文明圈的周边地区，和北方的骑马民族类似，具有武的文化，从丰臣秀吉时代开始就图谋出兵中国，对中国虎视眈眈。尽管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与（日本的）资本主义形成密不可分，但也包含周边国家入侵这个因素。总之，中国的周边国家在中国本土衰落的时候肯定会进行入侵，这种历史现象在王朝体制崩溃的这38年里也以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面目毫无例外地出现了。这个时期的中国就好像正在蜕皮的巨蟒，即使对小动物的攻击也无法进行充分反击。但是最终中国还是驱逐了各式各样的入侵者，成功地建立了新国家。

如果我们把鸦片战争的历史观和反帝反封建的历史观置于历史长河中就会清楚地发现它们是很有局限性的，它们只是为了20世纪的需要但并不适于21世纪今天的历史观。

V

那么我们在21世纪的今天，希望通过什么样的视角来勾画中国的历史呢。

最近笔者在《思想》杂志“思想的语言”一栏中，发表了一篇题为《纵带与横带》的文章，笔者在结语中写道：

清朝以与民间力量的相互补足性的结合作为权力的基础，民间的力量在与权力结合的同时逐渐壮大。正是这种力量导致了太平天国运动（1854—64年），而为了镇压太平天国，就必须组建湘军、淮军等地方军队（后来的军阀），这样连军队也逐渐由民间控制了。湘军、淮军的崛起被当时的革命派汪精卫称为“满人的中央集权正被取代，汉人的地方分权正在开始”（《民报》8号），这个评价的确一语中的。像这样以省为行政单位的官、军、民的权力的构筑及独立，导致了王朝体制走向最终的灭亡。……38年来，（中国人在）列强的干涉内政、军阀割据、南北中央政府的对立、日本的侵略等鸦片战争以来持续不断的苦难中，在将王朝时代的天的统治理念（均贫富、万物各得其所、民以食为天）脱胎换骨为大同主义、三民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理念的同时也继承了其中的一部分，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就是我说的“纵带”。为了避免误解，这个纵带不是具备形态和性质的固定实体，仅仅是一个表象（Image）。纵是指时间的流动，带是指时间带来的变化的性质。比如，直到明朝中叶，还限于是士大夫阶层道德律的儒教，被王阳明推广到了民众阶层；到了明末清初，宗族结合伦理和乡村秩序伦理，作为“礼教”在民间广泛普及；民国初期尽管被批判为“吃人的礼教”，但宗族制中的相互扶助、相互保险体系还是延续了下来；毛泽东在革命胜利后，至少在文革以前，也重新将相互扶助包装为专门利人的社会主义伦理并在全中国范围内推广。为此，在儒教里为适应时代而产生的多种多样的变化及其展开以及在变化中出现的连续性和非连续性的形态被笔者假定为“带”。一方面，横带就是指众所周知的19世纪后像环游世界一样席卷亚洲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西方的近现代文明这三个“近现代”。

VI

从纵带和横带交错的观点看，原来的仅仅重视横带、即前面提到的像鸦片战争历史观那样的见解是非常单纯的，就像（把历史）分为传统和近现代那样，传统被大致看成是抽象的、静止的和固化的事物，而丧失了传统正是在逐渐现代化的“现代”巨变中演变、延续的这种变动和现代的视点。目前对中国近代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横带的反应（反帝、反殖民地、抵抗，顺受）这个侧面，而缺乏从纵带的变动和展开的侧面来研究横带的视点。

正因为如此，诸如现代中国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这样的两分法式的思维一直络绎不绝。为了回答这样的疑问，应该不仅将横带而且将纵带也包含进去，从全局的角度考察纵带横带交汇的现代中国。

从纵带来说，欧洲的近现代也是一个纵带，它与中国的近现代并不一样，反过来说我们必须坦率地承认中国的纵带并不等于欧洲的近现代。我们期待在近现代这样令人头疼的历史时代划分中，我们亚洲人不应被局限在横带，而应自然地将纵带融入我们自己的历史。

以上是我关于用历史的眼光观察现代中国的报告。

（刘星 译）